

近40年寻访5000多个传统村落,胡彬彬——

“每个村落都是正在续写的文明史”

本报记者 何勇

讲述·一辈子一件事

人物小传

胡彬彬,1959年生,中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曾寻访我国5000多个传统村落,致力于推动中国传统村落文化的保护,入选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第二批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等。

岳麓山下,一座老建筑的顶楼,记者见到了刚结束田野调查回来的胡彬彬教授。

年过花甲,胡彬彬还是喜欢经常带着学生去做田野调查;一年中,至少200多天待在村里。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胡彬彬的工作始终处于满负荷的状态,他以平均每年不少于140个村落的节奏,累计寻访了5000多个中国传统村落。

“绝大多数关于传统文化的记叙,都能在村落里找到具象的传承”

“传统村落承载了无数历史文化信息……”胡彬彬甫一张口,便是老本行。

他的办公室立着一根挑柴的纤担,高约2米,中间似扁担,两头像弯月,木头制成,两头扁担与弯月处的连接处用竹鞭编成的图案十分精美。这是他从湖南城步苗族自治县的侗寨里带回来的,是明代侗族男性的劳动工具。

胡彬彬给记者讲述了来由。山里的侗寨建筑别具一格,屋门只有门,没有锁。家中男主人如果出门打猎、砍柴,就会将纤担斜放在门前;女主人如果不在家,门前放置的可能就换成竹篮,或挂上一根纱线。

“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古人对劳动生活的态度,这个纤担里都有答案!”胡彬彬说,“绝大多数关于传统文化的记叙,都能在村落里找到具象的传承,但文字记载非常有限,村落的天地广阔无边。”

坚持近40年的田野调查,胡彬彬“白天找实例,晚上找文献”,不断有新发现。

2016年,胡彬彬和同事刘灿姣在湖南江永县发现了长江以南地面建筑中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壁画作品之一——水龙祠壁画。壁画面积达到380平方米,比此前《中国美术史》中记载的77平方米最大壁画大了几倍,对瑶族文化研究有极大帮助;在对湖南靖州发现的“群村永赖碑”进行考证后,他又用一年半时间,走访调研了碑文中提及分布于湖南、广西、贵州三省区五县的24个苗寨,最终写出《靖州“群村永赖碑”考》,确证此碑为目前我国古代较早的、具有完整立法构成要素与意义的、有关少数民族婚姻制度的地方立法。

几十年来,寻找“活”着的文化,在传统村落中“寻根”,是胡彬彬不变的信念。当胡彬彬眼触手摸这些奇迹般幸存于村寨中的古代民居,走入厅堂,摩挲着家居实用器物,那些濒临倒塌、破败废弃的牌楼、族氏宗祠的梁柱、门扉、窗棂,成为他一次又一次创新性研究的灵感来源。

北至黑龙江省黑河四嘉子满族乡东、西四嘉子村,西至新疆乌恰县吉根镇托阔依巴什村,南至海南陵水黎族自治县黎安镇南湾村,都曾留下他的足迹。

“书中对古代乡村的描述,在下乡途中感受越来越清晰”

世代居于湖南双峰县的胡家人,基本上只从事两种职业:郎中或私塾先生。

一个典型的中国传统小知识家庭——胡彬彬这样定义他的成长环境。小时候,他接触的是家族里藏的几万卷古籍、书画;再大些,他跟着行医的叔叔爷爷走村串户治病救人。叔叔爷爷治病不收钱,作为报答,那些村民会偷偷塞个鸡蛋、一块红薯给年幼的胡彬彬。“温良恭俭让,这些传统美德,就这样植入幼年的我心中。”

1978年,胡彬彬进入邵阳师范专科学校(现邵阳学院)学习。毕业后,胡彬彬进入邵阳市政府,当了一名公务员;他的上级是个“泥腿子干部”,常常带着他下乡。“鸡栖于埭,柴门犬吠,书中对古代乡村的描述,在下乡途中感受越来越清晰……”胡彬彬说。

那时,胡彬彬开始大量撰写与村落、文物、工艺有关的论文。2001年申报文博与工艺美术系列高级职称,胡彬彬是唯一一位以公务员身份、破格获得此系列正高级职称的获评人。他后来也被南京博物院聘为研究员。

胡彬彬说,“从参加工作起,传统村落就是我魂牵梦绕的领域,这个广阔的天地并不比任何书斋逊色。”

“传统村落的文化保护、研究与振兴,正面临新的机遇”

2003年,胡彬彬来到中南大学创建了“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

“终于不再是一个人战斗了。”在中心,胡彬彬对学生的要求是“三在”,即在课堂、在书斋、在文化现场。在课堂或书斋,需要签到、打卡;去文化现场,要进行长达几个月的拉网式考察;或者是时间不定的主题任务,发现新情况就即刻开展深度调查。

那时候,胡彬彬发现自己的研究正面临一些挑战:不断加速的城镇化,使得传统村落不断消失……

“每个村落都是正在续写的文明史。”胡彬彬说,“亲临现场,才能获得一手信息,他和



上图:胡彬彬(右)在西藏墨竹工卡县一户农民家中访谈。资料照片 吴灿摄
左图:胡彬彬旧照。

团队的研究从实物资料和亲临现场实地调查着手,完全靠双脚“走”出了研究成果。

近40年来,他考察的足迹遍及全国各地,时常青灯伴孤影伏案劳作……胡彬彬写下300多万字的考察札记,拍下近20万张数码照片,手绘近千张传统村落建筑式样图,撰写研究专著十余部,在海内外核心期刊上发表各类研究论文80余万字。

“胡教授在家排行老三。我们就叫他‘拼命三郎’。他几乎全年无休,在农村一待就是几个月。”刘灿姣说,胡彬彬进行田野考察时,在农民家里搭餐或野地里泡面充饥,寄宿无门时就风餐露宿。由于长期在外奔波,他曾经一年磨穿11双鞋底;由于经常野

编辑手记

脚沾泥土 手撷芬芳

刘涓溪

站在水龙祠壁画旁,胡彬彬倾听瑶族文化的声声诉说;在对“群村永赖碑”考证中,胡彬彬探索我国少数民族古代法律制度的雏形……在他的人生坐标系里,寻找“活”着的文化、在传统村落中“寻根”,似乎成为所有工作生活的“原点”。他奔波在田野上,其心也坚,奋斗不止,用脚底板“走”出了一项项研究成果。

在胡彬彬看来,文化研究不能脱离实地考察,只有脚沾泥土,才能手撷芬芳。胡彬彬要求学生到文化现场去,进行长达几个月

的拉网式考察;他以身作则,一年至少200多天待在村里。

胡彬彬觉得,对传统村落的保护,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必须和时间赛跑。正是这种紧迫感和责任感,让他对事业的崇敬、对人生目标的敬畏,推动着他不断前进。当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给传统村落保护带来了新机遇,胡彬彬带着他的团队着眼国家所需,扎扎实实做好田野调查和研究,必将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驻村书记

重庆市黔江区沙坝镇木良村交通不便、耕种困难。2016年3月,中信银行重庆分行员工肖鸣被选派到该村任第一书记,与当地干部群众埋头苦干,攻坚克难。2019年该村实现贫困人口、返贫人口、新增贫困人口“三清零”目标。2020年3月,肖鸣任期届满,继续留村扶贫。图为1月13日,肖鸣(右)在查看村民晾晒红薯粉。杨敏摄(人民视觉)



“没想到在遂宁,200多亩土地,7万多平方米厂房,从签约到投产,除去疫情停工的时间,一年就成了。”站在高大崭新的钢构车间门口,成工重工机械有限公司研发制造本部负责人蔡政军高兴地告诉记者。让成工重工下定决心搬家的,正是遂宁市纪委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创新“作风漂浮”治理工作机制,打通优化营商环境“最后一公里”。

据了解,遂宁市委将2020年作为“营商环境优化提升年”,遂宁市纪委推行重大项目勤廉保障机制,对重大项目“一对一”配备勤廉监督专员,开展“探头式”驻点监督。2020年5月,遂宁市纪委、市监察委员会印发了《遂宁市纪检监察机关深化容错纠错激励干部担当作为实施细则(试行)》《遂宁市

四川遂宁纪委治理“作风漂浮”行为——

打通优化营商环境“最后一公里”

本报记者 宋豪新

纪委监委失实检举控告澄清工作实施办法(试行)》,通过容错纠错、澄清是非、回访教育“三管齐下”,激励全市党员干部积极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不到一年,遂宁全市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可办率提升至100%。“一窗受理”事项达90.6%,行政许可“最多跑一次”事项占92.8%，“一网通办”事

项达99.86%,相关行政许可事项由140个法定工作日缩减为最短22个工作日。

与此同时,遂宁市持续深化“纪检监察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模式,及时曝光损害营商环境问题,限时督办整改,开展纪检监察干部入企走访等工作。遂宁市纪委研究出台了《关于加强纪律作风保障促进民

营经济健康发展的二十条措施》,清理“拖欠民营企业无分歧账款”5419.1万元,打通了优化营商环境“最后一公里”,既有效解决了本地一些干部不尊重企业、不关心企业家,一些政策公开透明不够、减税降费政策落实效果不好等影响或损害营商环境的突出问题,又强力推动了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我们严肃查处了一批损害营商环境的行为,为发展壮大民营经济、全面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提供了有力的保障。”遂宁市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谭晓政告诉记者,遂宁市纪检监察机关以强烈的责任心和事业感,深化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用好容错纠错机制,扎实做好“作风漂浮”治理工作。

走“贵州新路”,迎“千年之变”!近期召开的贵州省委十二届八次全会和省委书记工作会议均明确,保持现有帮扶政策、资金支持、帮扶力量总体稳定,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贵州曾是全国脱贫攻坚主战场,全省88个县(市、区)中66个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脱贫难度大。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一系列精准有效的特色战法,贵州一举从全国贫困人口最多转为减贫人数最多,书写了中国减贫奇迹的贵州篇章。

入深山找水源 高速路县县通

曾几何时,水在山下流,人在山上愁!吃水不愁竟成了贵州几代人的强烈期盼……

“村子不通水,除了‘望天水’,家家户户得翻山挑水,不起眼的扁担竟吃了香。”为吃上水,剑河村民田全和四处辗转,最后转战河边,“看着不远,一个来回不下一两个小时,全是泥巴路。”

费尽艰辛挑来的水,还得精打细算省着用。舀盆水,先洗脸,后洗脚,最后喂养牲畜或洗几件衣裳。“每天一睁眼就得挑水;因为缺水,产业搞不起来……”像田全和这般因水揪心、为水发愁的村民不在少数。

生活用水、产业用水不解决,谈何过上好日子?

贵州原本不缺水,但典型的喀斯特地貌,严重的石漠化现象,以致土地如同巨大的漏斗,造成“地表水贵如油、地下水滚滚流”的尴尬。破解“吃水难”,告别“望天水”,贵州找准症结,入深山,找水源,重点建设521处骨干水源工程,已建在建水库3700多座。

如今,清澈的自来水代替“望天水”,贵州受困于水的局面正在改善。“自来水就是方便,这下扁担可以收起来咯。”拧开水龙头,望着喷涌而出的水柱,田全和洗了把脸,顺势冲洗院落……

告别“吃水难”,还要解决“出行难”!由于“地无三尺平”,平原地区修3公里路费用,在贵州只能修1公里,桥隧占比超九成的不在少数。

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誓教天堑变通途!“十三五”期间,贵州交通投资8873亿元,是“十二五”的1.4倍,2020年底高速公路总里程突破7600公里。2016年初,贵州成为西部第一个“县县通高速”的省份;2017年底,贵州实现建制村公路通畅率100%……

选定主导产业 配套技术团队

推进农业现代化,将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这是多彩贵州新未来的应有之义。

过去受制于基础设施、思想观念等诸多因素,贵州农业长期处于“小散弱”的局面,农产品要么“好的不多,多的不好”,要么“样样都有,但样样不成规模”。

如何汇聚起强农兴农力量,推动农业发展、农村繁荣、农民增收,事关脱贫攻坚成色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纳雍县勺窝镇从种过桑、养过蚕,2019年,当地抓住东桑西移契机,发展蚕桑产业。两年不到,这个大山深处的穷镇破茧而出,成为小有名气的“桑蚕小镇”。转变的背后,是千部群众的艰辛付出。

2018年初,贵州在全省发起一场深刻的振兴农村经济的产业革命,表面看是改种作物,究其根本是要转变思想观念。

“群众会、板凳会、院坝会,大小开了几十次,软磨硬泡,只有少数几户松了口。”联新社区党支部书记马玉华说,“最难的时候,前手刚种下桑树,村民随后悄悄拔,只能边补边做工作,前后折腾了10多次。”

从种桑到养蚕,前后不过3个月,每亩增收超过3000元。村民们来了劲头,如今全村桑树种植增加到700余亩。按照这个势头,今年底八成以上的坡耕地将满园桑绿。

为深入推进农村产业革命,贵州选定12个主导产业,分别成立12个产业专班,并配备12支技术团队,真正让农民种得好、种得精、能致富。如今,贵州茶叶种植700万亩、蓝莓18.2万亩、李子254万亩,培育了一批特色农产品品牌。

如今,随着黔货出山愈发便捷,贵州农村正因产业革命而发生深刻变化……

一步住上新房子 快步过上好日子

宽敞的楼房,整洁的道路,一应俱全的配套设施……如果不是易地扶贫搬迁,罗应和可能仍困在深山。

罗应和的老家惠水县摆金镇,地处滇黔桂集中连片石漠化贫困地区。要从根本上斩断穷根,又要守住生态底线,唯有搬离大山,换个活法。2015年,贵州打响易地扶贫搬迁“第一枪”,一场以城镇化安置为主、决意改变近200万人贫穷命运的大迁徙上演……

2016年7月,罗应和同5000余名村民一起,搬到惠水县明田街道新民社区,一步住上新房子,快步过上好日子。

如果说搬得出是“前半篇文章”,那稳得住、能致富则属于“后半篇文章”。“社区里,医院、学校、超市、农贸市场样样不缺,附近还办起扶贫车间,家门口就能就业,日子咋能不红火!”通过选举,罗应和当选为社区党支部书记,带领搬迁群众奔向幸福生活。

2020年11月23日,贵州省人民政府宣布:全省剩余9个未摘帽的深度贫困县全部退出贫困县序列。至此,贵州累计实施易地扶贫搬迁192万人,“十三五”时期易地扶贫搬迁任务全面完成。

“不单是改变居住条件,更要追求可持续发展,帮助新市民实现从苦业到乐业、从优居到优居的转变。”安龙县五福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肖亚琪说。

4年多时间,贵州建成946个安置点、45.39万套住房,解决323.8万名贫困劳动力就业,实现户均一人以上就业目标。

田埂上,车间里,社区中,一张张纯朴自然的笑脸,传递的不仅是摆脱贫困的喜悦,还有多彩贵州新未来的愿景!

通水修路、发展产业、易地搬迁等多措并举——

多彩贵州 奔向新未来

本报记者 万秀斌 汪志球 苏滨